

DOI: 10. 3969/j. issn. 1674 - 9391. 2012. 03. 002

70 年致力于民族学研究的学者

——西南民族大学陈宗祥先生专访

陈宗祥/答 覃 影 张 强/问

【摘要】陈宗祥先生是我国最早介绍、研究《格萨尔》史诗的学者之一，也是《白狼歌》研究具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。他翻译的《格萨尔王传》被认为是最早研究格萨尔的参考资料之一，他提出“白狼语—南语—西夏语—普米语等一脉相承”的重要见解，被认为是对南语研究的一大突破。陈宗祥先生尤其将70年来对民族学乌牛白羊两系的探索，贯穿到他对东汉《白狼歌》部落史、古蜀史的考证和敦煌古藏文《南语写卷》的翻译研究上，独树一帜。学界鲜为人知的是，20世纪40至50年代，陈先生收集和翻译的海门道夫的中印边界东段调查报告，最早向国内介绍了喜马拉雅山麓南侧坡九万平方公里地区的情况。我们荣幸对陈宗祥先生进行了独家专访，陈先生首次对自己的人生、学术经历和学术思想做了回顾和总结，是授权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访谈文章。

【关键词】陈宗祥；民族学；《白狼歌》研究；《格萨尔王传》；南语

中图分类号：C95

文献标识码：A

文章编号：1674—9391（2012）03—0004—15

作者简介：陈宗祥（1919—），男，汉族，浙江宁波人，民盟盟员，民族学家，我国最早介绍、研究《格萨尔》史诗的学者之一。1940年毕业于辅仁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兼学历史专业，1942年12月肄业于辅仁大学研究生院人类学部。1953年4月随四川大学民族组并入西南民族学院研究室。1987年任宗教学硕士研究生导师，1989年初退休。历任辅仁大学、华西协和大学边疆研究所、西南民族学院、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助教、讲师、副教授。覃影，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学院副教授，历史学博士，研究方向：历史地理；张强，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硕士研究生，研究方向：历史文献学。四川 成都 610041



图1 2012年3月26日陈宗祥先生亲自审校访谈稿
（张强摄于成都玉林村陈先生寓舍）

前记：2012年1月15日，我们受《民族学刊》“西南民族研究院成立10周年”纪念专栏

之托，到玉林村拜访了老一辈民族学家陈宗祥先生。陈老思维活跃，说话中气十足，全然不像一位即将93岁的老人。几天前陈老刚刚出院，卧病在床，仍为我们作了两个小时的解答。2012年3月14日晚七时，我们再次来到玉林村陈老住宅续访。老人已对第一次整理的访谈录作了认真校改，并针对原先所提的问题，手写补充了李安宅、任乃强先生传授藏学的有关情况。

2012年3月19日上午11时，我们再次拜访陈先生，庆贺老人93岁的生日。陈先生这次扼要谈了对青年的盼望，我们也从谈话中了解到他有两凉山彝族调查的经历，有两大工

程要做,基本理清老人一生的重要经历。

2012年3月26日上午10点半,我们对陈先生进行第四次访谈。陈先生和他的二女儿陈小珍老师已将二次校稿准备好,陈先生给了我们一张明代《松潘边图》、他的《明季〈松潘边图〉初探》论文复印件、论著目录一份、《古蜀建筑史研究》大纲一份、两幅插图(附本文)和对访谈提问的手写答复稿。陈先生在这次谈话中主要讲述了对古蜀国研究的看法,以及他与建筑工程师江道元先生的合作,这对古蜀史的研究将相得益彰,并再次强调对外国学者有民族学“伽利略”的提法持否定意见。2012年3月28日上午11时,张强完成对陈先生补充问题的采访录音。陈老主要谈到80年代和退休后的一些情况,认为80年代的教学经历也很重要,并对“民族走廊”进行了补充。

在近四十天的录音访谈和校订整理工作中,陈老不顾卧病在床,身体虚弱,仔细解答我们提出的七个问题,并借助放大镜认真审校我们每一次的整理稿,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他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与和蔼可亲的师者风范。访谈整理主要是根据陈老多次的口述录音和手写补充稿,经重新设计提问、分设若干主题归纳而形成,读者可以据此了解陈先生的学术思想,以及他的人生和治学经历,一睹他的不平凡人生所折射的人格魅力。



图2 2012年3月26日陈宗祥先生在与覃影博士交流

一、陈先生,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。我们整理了您的论著目录,按发表情况,大致是解放前40年代的对凉山彝族社会、文化、制度的考察研究时期;1978年以来《格萨尔》译评、《白狼歌》研究的高潮时期。您如何看待和评价您不同时期的治学情况?作为后学,我们很想知道您是如何指导和教育学生的。

1952年,高校院系调整时我们被调整在川大,后来王维舟院长,就是十八军的王老,他说这些老师搞了几十年民族学,摆在川大不对,还是要摆在民院。所以1953年3月,他又把我们几个老师与十几个学生调到民院。

因为我喜欢查书,大学的外文书又多,我关注西藏,已经在编康藏外文目录。我发现一查到中印边界东段,美国的、英国的书都把藏南这个地方抠掉,中印边界东段遭抠了。我说这个不对,于是就用打字机把材料打下来,那时没有复印机,打下来的材料就放到身上。当时夏康农副院长在负责民族调查工作,他问中国到底有好多个民族,大家就瞎猜,有的说一百种,有的说五十多种,有的说……,我就哼了一下,他们都朝我看,我就说还有不知名的民族。他们问我,有没有这个材料?我说有,在中印边界的东段。夏院长就叫我把下午安排的工作停了,先翻译这些材料,如果人手不够,再找玉文华(我们师兄弟)。翻完了,吴泽霖教授就看,结果一打印,不现字迹,等于白打。没办法,吴泽霖说,我们把原稿加上那张地图,一起送到费孝通先生那里。于是资料送到中央民族学院,他们进行了打字和整理。1953、1954、1955年就发生中印边界东段的事,人类学家海门道夫去调查写的一篇文章,恰好是我看到才翻的这篇读物。^{①[1]}海门道夫出书了,书拿过来,吴泽霖又翻了。^[2]这样中国才有了材料,包括喜马拉雅山南侧坡的九万平方公里地方,这里民族太丰富了,还没弄清楚。因为我搞西文编目,才搜索到这些资料。

1950-1960年,我的研究成果少一点,我本来可以写一大串,但1955年、1956年,我被肃反了两年。

我1957年被戴上帽子,1958年3月,我们这部分人被下放到西昌地专农场。1961年,我患水肿病,脸部和双腿都肿了,变成有两个粗腿的大胖子。西昌医院的医生专门检查我们,首先就看到我,他跟我说,医院奉上边的指示,像我这样的人不要劳动。恰好地质学院办公室的邓文峰同志也到了这里,一聊起来,才知道他真是懂不少,不仅仅是语言学。之后,我向他提语言学问题,他给我解答,因为我对这些问题莫名其妙。我们不用课本,二仙谈道,就这么开始谈,我开始学,

一直学了十五年。后来，他说我的语言学问题多，让我考虑选题，我们俩共同搞，并囑向场长请示批准。我在西昌图书馆借阅了世界书局出版的《册府元龟》，我亲耳所闻，这是我们辅仁大学校长陈援庵（陈垣）最推崇的一本书。我抄下东汉时三首《白狼歌》，四十四句的译义与注音，抄写了才174个字，总共是三百多字，音、义都有了。我马上把抄下的东西给邓文峰，我想这个对找《白狼歌》原字的音有用，我们俩想搞《白狼歌》。当时，我们摘帽了（平反），都有了点时间，劳动也松多了。我就请示农场场长刘强辉，我和邓文峰没事想搞一搞学术，主要是《白狼歌》研究，请他批准。他同意了。后来，吃好一点，不劳动，我的病慢慢见好，而且《白狼歌》研究也有了进步。邓文峰懂语言，我搞历史，原先大家猜《白狼歌》是彝语，我们调查认为不是彝语。1964年，我调回民院继续工作。邓文峰的语言工作行将结束。我认为党夏珠同志提供的部落史资料，也该由我整理出版，把这两部分合出一本书。这就是我们合作的《白狼歌》研究（一）1991年第一版，得到学校和四川省民委的支持。现在又出了《白狼歌》研究（一）2010年第二版（增订版）。

还在华西边疆研究所工作时，1945年李安宅老师跟我说，有个机会去凉山搞彝族调查，让我停下手中的工作。我说，太高兴了。但我提出了一个意见，希望李老师能够给我找一两个导师。因为我一向跟他在学藏学，这下换个新的（彝学），我一点都不知道，要抓瞎。他让我即刻跟他走，去见的老师就是后来华西坝金陵大学（当时在成都）的马长寿教授。马长寿是搞彝族的，当时他在睡午觉，李老师把他叫起来就介绍。马长寿很高兴，他起来擦把脸，李老师走后，他就和我到小天竺街的茶馆去谈。马长寿跟我说，如果我定了去凉山，还有位老师就是冯汉骥教授，冯老师等着见我，让我去见他。冯老师是我熟悉的老师，听过他的课，这下要投他的门了，我说好。当时见面，冯老师很简练的几句话，说这次去凉山，什么叫黑骨头，什么叫白骨头，让我好好研究；说一半的对他都赞成，说错也不要紧，以后会改的，但是让我大胆地说出来。同时他说新西兰民族会系谱学，让我注意系谱。后来我没看冯老师的讲义，他说要用系谱的办法来慢慢地恢复

历史。

从那以后，我就跟马长寿。马长寿的彝族书出来了，我的就出不来了。^②

1966年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，红卫兵要抄家，他们来过七次，把我的一切弄的荡然无存。我一共有五本书被毁。一是我的两匣子关于康藏的外文目录卡片，我原来打字出来就已经是一本书了。第二本是“《全唐文》吐蕃资料汇编”，摘抄有六七十万字，这么厚，也给抄了，这两本书就毁了。第三本是我在凉山苦了三年，写完了横越大凉山的游记，这本书我没印。第四本书关于乌抛家这一支头的全社会、全支头的奴隶情况；最后一本书是十九个项目^③的调查，背靠背的调查，我把这些资料都理出来了。这后面的三本书分别摆在三个地方，结果还是全部被毁。从这本《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研究》中，我查到1976年起，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调民院冯元蔚同志、徐铭同志和我，去编写《凉山彝族奴隶社会》一书，用去三年时间。本来由云南、贵州、四川三个省合作，云南和贵州都没来，最后四川省内各单位参加搞。当时民院调了三个人，我们院长冯元蔚是彝族，他当领队。我们调到李绍明所在的四川省民委，收集关于奴隶社会的资料，这书里边有我的东西。

我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，文革抄家只有一本逃出来了。我把《格萨尔王传》稿本交给何剑薰教授，他拿到青海印了，这才保存下来。^④这本书都是内部出的，标注“内部刊物”四个字。我想拿到北京或者天津，把它对外公开、正规出版。总是一本书嘛，而且是《格萨尔王传》研究最早的一本书。

我现在弄的东西全都在（双流新校区图书馆）综合馆，有一个专门陈列的展柜。包括四份原文敦煌古藏文的《南语写卷》，这本书还没出版，但是复印件已经在那。还有一本《格萨尔王传》（译著《岭地超人格萨尔王传》）、两本《白狼歌》（《〈白狼歌〉研究（一）》第一版和增订版）。

1980年没写作，因为我想休息。教务处长张汉成突然下令，让我准备《民族学概论》教材，他们安排我在最近一年或者两年上课。我说好。正是利用这一两年时间，我赶紧突击编《民族学

概论》。我一门心思在屋里编教材，什么都不管。

1982年秋期，20多个学生来听课。我首先请学生们告诉我姓名、族别和家乡地址，以便选两个学生去他们的家乡作民族调查。他们当中四川东边西秀黔彭的土家族学生比较多，西边的少数民族学生缺少。四川的土家族跟汉族水平一样，很容易考上。但是我心中有数，只有一个普米族的学生，叫胡文明，当然就很看重他。因为，我让学生写名字，写族别，写家乡地址，就知道了学生情况。我每年暑期都要带学生上山，第一次选的两个学生，一个叫杨松，苗族，第二个就是胡文明，调查地点在木里县。那个时候县政府还能承担一些开支，学生不是普通伙食，和我一样待遇。这年夏季的40天，两个学生一个教师，我们工作得很好。我请了一个名叫董吉三的“汉规”，“汉规”就是懂藏文的、做过道场的祭司。在“汉规”的帮助下，我们的藏文熟练多了，我还有他的相片。后来换成了党夏珠。另外，我需要抽点时间告诉学生把问题写出来，再去写论文。如果感到材料不够，明年去家乡再做补充。如果发现意义的文章，帮助学生略加改动，投交当地杂志发表，署名和稿酬全部是他个人的。

我自1982年讲授《民族学概论》，到1989年退休下来，八年一共带了16个学生。16个学生里，发现三个有研究潜力的少数民族学生。一个是胡文明，第二个是梁丽蓉（音），女的，凉山彝族。还有一个是代刚，康定藏族，现在是研究员。胡文明、代刚两个成功了，梁丽蓉（音）也是个人才，她有篇论文写得好，很认真，我也认真地看，帮她修订，还加上《清实录》的资料。梁丽蓉是彝族，我就投给《凉山民族研究》了。

胡文明是我现在最棒的学生。他很聪明，领悟能力高。我们师生两个有缘。他不但普米语，而且彝语也特棒。胡文明论文也写得很好，我把它推荐发表在云南的杂志上，之后，格勒在北京看到又发了。因为那个时候，做研究的人少，真正动笔、动脑筋做出来的人，胡文明算一个。这次校庆（60周年，2011年6月1日）胡文明来了，我劝他说，《简史》（《普米族简史》）暂时不忙写，他写过两本。他应该把普米语的老大哥於弥[*yu mi*]语，

於弥语就是西夏语，好好搞一下。我跟他他说，他语言天分那么好，一口流利的彝语、普米语、汉语，如果搞一搞南语，搞一搞他们普米族的文献，这样他们就有1500种的宝贝，他穷其一生也翻译不到多少。他现在四十多岁，到我这个岁数，翻译出来三十种，就很伟大。而且他不是写简史了，改为写通史。我有五种西夏文字典，还有两种藏文的，他可以拿去，他们那里的藏文多，藏语多，懂得的人也多，可以多学点。所以，这个语言学要搞下去，对现在西夏文的研究，能起到重大的变革作用。不要只看到我们现在是起步，黄布凡^[3]教授的音位系统抓下来之后，就不得了了，因此这是关键阶段。

另外一个学生叫代刚，他是刚成立甘孜州民族研究所就去的。我跟他他说有两个重大的问题，如果把它们收集起来，他的甘孜州史就成功了。一是《格萨尔王传》那部书提到，邓玛岭土司取邓柯（现在划归德格县）为中心建的岭国，其实就是隋代的附国，而且以道孚县北为界。我翻译的《南语》也说到隋代的附国，一字不差。任乃强老师对隋代附国也有研究。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康定。木雅（*Mu Nia*）、西吴·杰布，其实是两兄弟，木雅是哥哥，西吴是弟弟。木雅到这儿没多久，西吴就掌权了，由康定一直到云南的宁蒗，到四川的木里这一带地方，都属西吴王辖领。代刚有篇文章关于“木雅”（*Mu Nia*），“木雅王”的记录，我给他修改，增加一点资料，发表了（代刚《康定“木雅”藏族部落历史初探》，《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》，1993年1期）。后来格勒看到，又给他发表^[4]，同时推荐他到的甘孜州民族研究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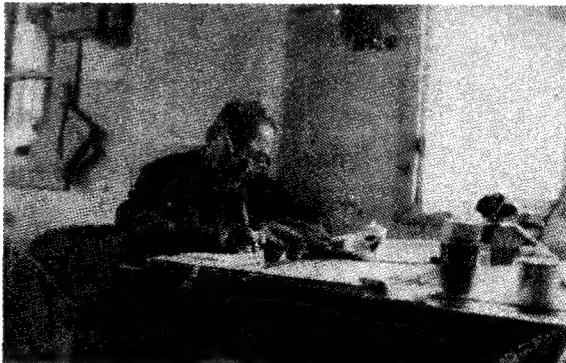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 1987年陈宗祥先生于成都玉林村寓舍
(照片由陈先生提供)

1988年秋,张汉成又找我,让我用外文向本校留学生讲授“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”,计80节课。于是,我把手上有的论文,先行译为英文。其中有:文学,如藏族格萨尔王传,彝族洪水故事等;宗教:藏族各教派,彝族的毕摩与苏尼;天文学:二十八星宿研究,藏族的,普米族的,纳西族的。其中,我翻译自己写的彝族宗教的那篇论文,打印并配图,因为外国人讲究图,到意大利又发表了。我还得了个荣誉头衔——意大利中远东研究所通讯院士——就是通消息写文章的院士。

1989年开学,20多个留学生到校了。他们分别来自菲律宾、日本、美国和德国等国。德国留学生还是个专家,他先到拉萨,然后到成都来听课。我不知道,还在讲拉萨的风景如何好,他底下在笑,说我可能没去过,他们已经旅游回来了。后来可能有机会去了,我等了一辈子,现在有高血压,仍没去成。我这80节课等于大考一样,晚上打字备课,必须要打两页纸,才敢上去讲。我有时忙到深夜,我的爱人就睡在这儿,我在那儿打字,她也忍耐了,没办法,知道是工作前途。最终这个事算过大考了。

1980-1988年,美国普几桑德大学与四川师范大学挂钩,每两年派一个旅游班来成都学习。每个旅游班大概有30多个年轻人,聘老师给他们作报告,只讲两小时,自己拟题讲座。川大有人讲考古,我讲藏画唐卡。我弄些画报,在墙上都铺满了,他们很感兴趣。我共去了3次。

1989年因感于年龄增大,身体虚弱,向领导辞去职务。退休后,民院每年暑假都办一个旅游班,找我们老同志去讲,我去了大概两三次。



图4 1989年陈宗祥先生退休后于木里县向党夏珠核对《南语写卷》的翻译
(木里县周明藻先生摄,由陈先生提供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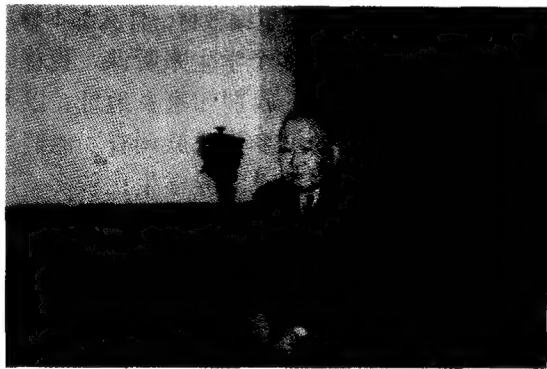


图5 2003年陈宗祥先生于成都玉林村寓舍
(照片由陈先生提供)

80年代正是学术发展、向高处走的阶段。但是由于我健康和年龄的原因,就没往前走了。

二、陈先生您祖籍是浙江宁波人,出生在北京,您能简单为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家庭背景吗?我们知道,您本科是辅仁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兼学历史专业,您当时研究的是什么,后来为什么研究民族学和人类学?

我父亲是农民家庭出身,他13岁就想往外跑,不想当农民天天插秧,而是想学做西服。因为我们浙江东部西服业非常发达。他拜了一个手艺不错的中国师傅,之后,随师傅到日本东京去。当徒弟的他就一面学手艺,一面干杂事。当时,刚好遇上东京大地震,把父亲吓坏了,他又跑回宁波乡下。他无功就回来了,什么也没学会,白去一趟。所以,村里的小孩开玩笑,羞他,讽刺他是“回汤豆腐干”。^⑤我父亲又有心思了,他考虑跟一个要去天津的师傅,到天津去发展。他在天津三年满的师,然后自己到北京去发展。我的奶奶又陪着我母亲到北京,1919年3月我出生在我父母的一个小作坊车间里。我家里有七个姊妹,我是男的老大,排行老二。我父亲会剪裁衣服,他在外找顾客兜揽生意,把材料弄回家里来做,我母亲也帮帮忙。后来生意越做越大,工厂也就慢慢扩大。在王府井父亲开了一家店子,店子前面卖材料,后面是小工厂。他很羡慕读书人,他自己没读什么书,13岁跟师傅到日本,但没有什么学问。他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读书人,对我们的要求就只有一句话:你要好好读书。

后来发生这么一件事。我起初读私塾,后来到了正规小学念书,我小学跳了一级,没读四

年级,当时只有三个人跳,我是其中之一。校长跟我说四年级不要读了,干脆上高小。跳级之后,我考上了中学。我正要去中学交学费,父亲来了,他跟我说不要念这个中学,还是去念小学。我听他的,他怎么说我怎么干。他把我领到汇文小学,汇文小学是个戴帽子的教会小学,^⑥因为那里英文棒,多教几个小时。他让我念这个,英文学起来快,而且我毕业可以念汇文中学,这里原来是燕京大学的底子。他对我们的教育,就只有一句话:你要好好念书。一个父亲的老客户——北京化学公司的经理建议说:子女最好送南开大学读化学,读化学可以制药,制药最容易发财。他听进去了,就让我弟弟、妹妹念南开。他们两个南开毕业,现在也是搞制药。所以这些反映了他的思想,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影响。我后来就不沾这个买卖,对这方面没兴趣,甚至还离开了北京,我有个兄弟念辅仁大学的经济学,后来家里是他接的班。

我毕业于辅仁大学心理系。起初我想考地质学,没考上。我看榜时,教务处的老师找我了,我说还没定是历史专业,还是别的什么。老师让我慢慢选,又说心理学很有意思,老师教授齐全,仪器齐全。包括体育1个学分,共需修14个学分,我只念13个学分,就能升级,叫我不妨试一试。然后他让我再问问系主任,还可以选什么,最后决定加不加入心理学系。我见了心理学系主任,告诉他我本来是考地质学的,辅仁没有地质学,若有古生物学,我想读古生物学。他让我到生物学系主任那里了解,如果有古生物学,我选修一学年就可以了。我说太棒了。我就赶紧到生物学系主任那里去问,他说由于系很小,没有设立古生物学。然后我又跑到社会学系,他们说不论我念人类学,或者社会学,都很欢迎。我在历史系选了中西交通史,在社会学系选了人类学。越学越有意思,越学越有兴趣。那个时候心理学的确是一门新兴的科学,我也是慢慢把心理学对付下去了。辅仁毕业的好多人都当心理学研究所的所长、研究员了,有的还到了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。卢沟桥事件时,我想等等,看看辅仁还办不办学,于是,我们两弟兄就跑到天津租界了。后来说办,又继续读心理

学。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,我才决心不再等复学了。

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《唐宋四大家的天才分析》(英文)。因为唐宋八大家人太多了,我做不下来。我写的是韩愈、王安石、苏轼、柳宗元。在熟读这四大家的历史传记的基础上,为每个人画一个圈,这个圈按照几个心理特质等分成相应的几份,并分别评分。比如韩愈的勤奋怎么样,聪明怎么样,记忆怎么样,活跃怎么样,各打多少分。做这样的四个圈比较难。论文的结论是爱迪生的名言:天才等于九十九分的勤奋,加上一分的灵感。结果我的毕业论文得了第一,还存在着,有老师看到,还提到这论文。毕业后,我在辅仁找工作,最后到了社会学系,他们内部都知道我是人类学的,不是心理学的。

瑞典的斯文·赫定(Sven Hedin)《我的探险生涯》,对我有影响。我中学时尽是念些杂七杂八的书,像《库克船长》、《哥伦布船长》这类探险的小说。斯文·赫定多棒!我说他能干我也能干,我也可以学地质,学藏文,将来也可以到西藏,到新疆去发展。

我在辅仁继续念研究生。写论文没有东西不行,于是就做收集《全唐文》有关吐蕃的资料汇编,每天没事就抄。1941年12月7号,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事件爆发了。燕京大学、协和医学院、辅仁大学全部关门。美国的系统完全关了,在京大学就全关门了。我下决心到成都,不等它复学。我跟父母商量,自己已经是研究生了,成都也可以研究,老师都在那。父母同意后,我就赶紧办了来成都的事。我那时新婚,但不要紧,我想先去成都探探情况,看能不能养她,然后再派人把她接过来。辅仁后来复学了,有些不能动的不能离开,像我这样的小伙子可以离开。像发现周口店北京人的裴文中,他就到了辅仁教书。还有搞西夏的王静如,这些不愿意走的知名之士,全都到辅仁去教书。那个时候也是够热闹的。

三、陈先生,您来到四川生活和工作,据说是顾颉刚教授1942年介绍您到成都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,师从任乃强、李安宅研习藏学。您曾说过:“我一生在四川省生活、工作的时间最长,应该是四川人。”对于您由北京

来四川这段机缘,我们很感兴趣。还有,任乃强和李安宅当年是怎样引导您治藏学的,对您后来的治学思想产生了什么影响?

1942年9月15日,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,我赴华西大学社会学系报到。李安宅是社会学系主任,当然向他报到了。我去的时候恰好只有李先生一人,谈话很顺利。我把顾颉刚先生回复我的一封信转交李先生。当时,顾先生是在国民党的重庆组织部,^⑦他对像我这样一个小人物的前途很是慎重。说不要来重庆,这是政治的地方,让我赶紧投奔李安宅先生,他刚刚成立华西边疆研究所,正需要人。我拿着这封信给李先生看。李先生读完顾先生的信,笑了,说顾先生不叫我介入政治,叫我投奔到这儿来,他很欢迎。李先生只看了那封信,就定了我到华西工作。他跟我说,时间很紧迫,冯汉骥教授要上课了,叫我去听课。说我学人类学的,去听听他怎么讲。听完了,一个小时到他那儿去,他给我找办公室,领我去华西边疆研究所。为了不让于式玉(这是他爱人)、玉文华(那是我的师兄)和我三人耽误第一课,他让我们赶紧去听,我们就去了。下来之后,他领着我到教育大楼,就是在总的办公大楼的后面,马识途先生经常在那儿办公。马识途是搞教育的。我们在教育大楼分了一间房子,作为华西边疆研究所办公室。他让我在这儿办公,坐在这儿。又问我都学了些什么,搞了些什么。我就谈了两点,一是在大学期间,我已经在搞国外的西文的有关康藏的目录。二是做收集《全唐文》有关吐蕃的资料汇编写论文。他跟我说,还是搞外文的,这个需要的很,既然已经开头了,就接着做下去。

李先生如何帮助我治学呢?一是启发性的座谈,再是抄东西,第三个就是听他开的“社会学原理”课,了解他系统的学术思想。当时冯汉骥先生在讲“人类学原理”,我这两方面都听了,对我帮助很大。

李先生又是怎么传授知识的呢?他采用了牛津、剑桥熏陶式的座谈。李老师坐在办公室抽着烟斗,没事就跟学生摆龙门阵(聊天)。他要求每周一次,说假如他在办公室跟人谈话,让我们转身就走。没有人的时候就进去,时间一个小时,超过了也没关系。这样得到很

大的好处。他等学生提问题,再启发性的把他的看法告诉学生。这样直接又快,对我们的脑筋开阔很有帮助,很解决问题。比如,我就拿《格萨尔王传》英文本和我的译稿过去请教他,我说这段翻译,不太理解。但是,他一看到题目译名,就说这个题目不行。我不知道这个Gesar怎么写,反正他不同意。他说我给你想想,他提了五六个,最后他用了“格萨尔”这个译名,“格萨尔”其实是他想到的,由我写出来发表,但问题得到了李先生的帮助。^⑧所以很多问题都是在这个场合解决的。

李先生既是社会学系主任,又是华西边疆研究所的所长,比较辛苦。当时,国民党交通部的部长、华西董事会的董事长张嘉敖提出:要办一个华西边疆研究所。人找到了,什么也弄好了,却不知道张嘉敖是去了美国,还是怎么了,他人一走,经费就没有了。但是李先生咬咬牙,跑经费,到处去求援,整天为了经费而着急。他这样很苦恼很忙,既要教学生,又要管研究所,也有自己的东西要急于写出来。他刚开始是搞宗教,每天要等华西坝没有人了,才写东西,有时候搞到夜深人静。他写累了,就在办公室睡觉。他的稿子没人誊,拿到我那里,让我给他抄。我很高兴,一方面先睹为快,一方面又学习藏族宗教的精髓。这样慢慢的抄,慢慢的学,对我很有帮助。

1943年的一天,我们单位突然很热闹,来了四个著名教授,他们一起来报到。我高兴得嘴巴都合不拢,自己的偶像到这个所里来了。第一个就是任乃强老师。任先生很艰苦,南充人张表方(张澜)帮助过他。他曾经徒步到北京求学,从成都出发,到秦岭,由秦岭到西安,由西安走到北京。这锻炼了他的地理学实地考察,他又喜欢历史,历史地理非跟他学不行。他与新龙土司的一个女儿(罗哲情错)结婚,他的儿子叫任新建。任先生特别对西康的、甘孜州的历史地理有研究。因为他进去西康很早,李鉴明老师一面当喇嘛,一面还在研究,就把他所有知道的东西,如数的告诉了任乃强先生。任先生笔又快,都把它记下来了。李鉴明跟任老师传下来的资料,准确性高,我后来翻译《南语》相关问题有证实,所以很钦佩他们。

第二个是谢国安,藏族,甘孜州的绒巴岔人,基督教徒,非喇嘛教。他会英语,藏文精通,我向他请教藏文,他几个字节都能给你写出来。另外一个就是谢国安的女婿刘立千,98岁去世。刘老师所有的书已完全公证,送给民族出版社,民族出版社还印了一套全集,在我们民院的后街全都有卖他的书,我去买过。谢国安和刘立千对世界都是有贡献的,世界好多学者,比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雷兴(Lessing)教授都来了,有什么问题都问他们师徒二人,他俩把材料写了,别人利用他们的资料发表,都要感谢他们,所以他们在世界上都很有名气。最后一个是刘立千的爱人,谢国安的第二个女儿(谢建君)。这家人真是人才,就住在小天竺街。后来我就不寂寞了,有时任老师回家,我就找他们摆龙门阵。所以对我们后学,真有帮助。我的运气太好了,机会太好了,尽是一流的教授,因此脑子里随时记着他们。那个时候,我们华西边疆研究所很出名。

在华西边疆研究所李安宅的政策是:我们没有钱出杂志,就利用国民党的杂志《康导月刊》,还有蒙藏委员会的《边政公论》;我们没有经费,就利用国民党的单位。1944年李先生让我去的马边“边民生活指导所”,^⑤就是他接的这样的单位,说我们利用它当实习的地方。我是第四任,这样到了小凉山。我在任三年,每年夏天总有一个学生来。1945-1947年,我曾横越大凉山。^[5]1948年因为联系去耶鲁大学,我就到了上海,没有事做,只等着李先生的消息。李先生当时已经在美国,^⑥他在给我办奖学金的手续,耶鲁人类学系主任欧兹古是他的师弟,他们同班感情很好。李先生去耶鲁就是欧兹古给他办了一个美国海盗学会(Viking Society)的奖金,这必须由美国人帮他申请。但是,那时我的情况没办法解决。这事原来非常容易,因为美国每年有好多奖学金,它都有一本目录,随便找一个奖学金,很简单的。然而,我要走的时候,已经停战了,年轻的男男女女都回了国,都想弄一个奖学金,到国外大学弄个学位。这么多的申请名单,奖学金分不到我了,所以李先生说这次真是没办法。^⑦后来我心想不去美国也没什么,我已经接触很多像李先生这样的老师,比如冯汉骥老师是哈佛

大学的,李安宅老师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,这个精神我已经吃透。

李先生还有一篇很重要的“祖尼(Zuni)学派”的文章(《印第安人祖尼的母系制度》(英文本)),太有意思了。这篇文章里,他介绍一个一个名教授之后,总在这个人的后面说两句不客气的话。他大概介绍了六七个很有名的教授,介绍他们这么好那么好,但是在最后一点上,点中要害,实际上他持批评意见。所以“祖尼学派”成了美国人类学系教科书的材料。这是后来一个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来学校(西南民族大学)开会,我们谈到李安宅先生时,他告诉我的。现在我这儿都有李先生的文章,因为曾经给李先生编书,他的文章都经过我。不过我也有遗憾。我在整理李先生的行装,十四口大箱子图书的时候,恰好翻到了一篇文章,这是在国外杂志上写的抗日政论,言辞正义的加以反抗。我跟他十几年,没看到他写过这类抗日的政论,可能因为身份的问题,他曾经是党员,后来脱党了。他避免谈这些,跟我只谈学术,这方面只字不提,学术就够谈的。我说将来把这篇抗日政论附上,一起汇编到他的书里,但是很遗憾,现在找不到了。李先生的稿子没收干净,关于祖尼的十二篇文章,送香港之后,我不知道有没有出版。另外,还有一本研究藏族宗教的书(《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》,中国藏学出版社,1989年),也不知道是否出版。因为,后来李先生的家属来了,用不着我协助了。

李先生从美国一直到英国伦敦,买回来十四口大箱子的书,全是国外的书。这些箱子堆起来比我现在的书房更长更高,取书需要弄上架子。李先生自己没时间念,我有一年的时间在堆箱子的房子里,其实我在念。这一年我简直高兴极了,这都是最新的图书!《南语(Nam)》就是他的书,我当时念的一头雾水,不懂讲什么,但是我记住了“Nam”的书名。我研究《白狼歌》之后,听羌族人背诵系谱,一开始就是“南喀”,羌族由母系转入父系,他们的第一个男性远祖名字就叫南喀。南喀是“天”的意思,推测南喀为“Nam”的音记。我把这个研究写成专文,也出了书。但我还是奇怪,忘怀不了。后来又碰到《南语》一书,我

就抓住不放,慢慢的研究,慢慢的解决了^⑧。

四、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《白狼歌》的研究,提出“白狼语-南语-西夏语-普米语等一脉相承”的重要见解,被认为是对南语研究的一大突破。这是您综合语言学、文献学、民族学和历史学等跨学科取得的成绩。您如何思考和找到解释这一历史语言一脉相承的方法,并且如何实施历史语言学的田野调查的呢?

我是《白狼歌》研究起家的。但是,还有更重要的,我在搞古蜀史。这是当时进去凉山三年,川大冯汉骥教授亲自指导的、最关心的问题。大的任务搞了68年。当时没解决,我也奇怪。其实也不奇怪,因为黑部落不是单独的,白部落和黑部落他们的分布有重叠,黑的是主人,白的是奴隶。他们都忌讳这个问题,黑的忌讳谈,白的更忌讳谈。他知道也装不知道,对我问的问题,他就装傻,不说。

后来还是《白狼歌》解决的。我们起初对《白狼歌》的调查,原来认同白狼语是彝语的说法,但是拿它跟凉山彝语四个方言对音,还有参考贵州大方彝语方言的《西南彝志》,都对不上。我们否定白狼语是彝语,之后,又与纳西族语言比较以后发现,纳西语也与白狼语不合。我们又调查发现,与纳西族错居的自称普米的民族,普米的含义就叫白人。我当时说普米语与白狼语对上了,没想到又碰了钉子。^⑨

我在调查白狼语的时候,偶然碰到一个普米族老汉。他是木里土司衙门的把总,叫杨德福。我已经调查到他的身上,他到医院我也跟到医院,寸步不离,请教他。我说,想跟他学两千年前的白狼语,请他帮忙看看整理出来的《白狼歌辞》。他推辞不掉,看了就到旅馆,我也跟去问他,第一句、第二句讲的是什么。他说:哎,你老先生白费,搞错了。他说,他们这里普米语有两种语言,一种是街上的普米语,一种叫於弥[yu mi]。^⑩因为我运气好,碰到杨德福说的普米族的古语於弥了,於弥正是西夏母语,因为历史上的种种原因,我在这篇文章(《“於弥”为噶末部落试证》,收入《白狼歌》研究(一)增订版附录)中,谈了这个问题。於弥是奴隶部落,吐蕃的贵族就欺负人,他要打某个部落了,就把这些部落的青年都调去当兵,让於弥部落搞后勤。有一部分於

弥部落的人就逃跑,跑到木里的三个小乡。

杨德福说现在说於弥话的人,大概还有几百人。我中学高中生时,曾经惋惜《甘肃日报》说的有个会说西夏语,懂西夏文的老头死了,他们认为西夏文已死,西夏语完全变成死语言。不然,不然。我碰到了普米族的於弥语,它是西夏母语。我就求杨德福教我,跟他套近乎,说他既然把我的结论否定,他说的就是准确的。后来,他给我介绍了西昌民族干部学校的党夏珠同志,我们从此结交,成了几十年的朋友,可惜,他先死在我们的前头。现在我把他的儿子党瓜珠请出来,黄布凡教授已经跟他见面,工作了六天,黄老师已记录两千词汇。一般必须要达到六千词汇,她才能归纳音位系统。党瓜珠学过9年藏医,藏文特棒,但是他的於弥语,我担心受影响了。

这说明於弥语还活着。木里有三个乡,一个在前所,一个在后所,再有一个是牦牛坪乡。^⑪我看地图上这三个乡,正是窝心。解放前由成都到木里去,骑马要十五天,由木里到大坝乡(现在叫牦牛坪乡),走路要三天。木里很偏僻,党夏珠的组人就住在牦牛坪乡,他的小组叫堡堡组。

民族学很注意这个问题:住在山窝窝里,卡在山沟里,跟外界不来往的民族,他们的文化永远没变化。但是,普米族男子说话变的厉害,普米族老婆婆变的不厉害。有的语言是老婆婆给我解决的。普米男子听不懂我的拼音,我拼音也没错,他就喊老婆婆过来听。这个老婆婆一听“啊哈哈”笑了,她说,这句话:“我想啊,我想不嫁给你”。我后来每次翻译到这儿,老想到这个老婆婆,她说:“我想嫁给你,但是我不愿意嫁给你。但是呢,我还是嫁给你了,我跟着你走。”就这么一句话:我是不安心,不愿意,不喜欢你这个人,我不愿意嫁给你,但是,我还是嫁给你,因为社会家庭的力量,逼的没办法,只有嫁了,才嫁出去的。一个在盐源,一个在木里的两个老婆婆帮助了我,后来男的不找了,我就直接找这两个老婆婆。这就说明问题了:调查研究语言,有的地方闭塞,语言不变,围绕锅庄转的女子,她没有、不跟外界接触,她的变化很少,所以她把语言保留下来。

党夏珠有一肚子的历史。他就慢慢倒出来,倒到我这儿。他在我家住了15天,把《白狼歌辞》检查了第一道。他从头第一句一直到末尾,又再给我来一遍。他这一来调子就定好,我把《白狼歌辞》的章数也分开,意思也懂了。只是文字还有点错,于是我查字典。一查字典都有,慢慢,慢慢地,才算理出来。

我碰到《白狼歌》,也碰到了这四大件敦煌古藏文的《南语写卷》。敦煌藏文卷记有时间。它的第一大件是757年以后写的,因为它涉及到757年的一件大事,历史上普米人逮到并杀害了唐王朝一个西昌的总督(叫杨廷进)。这件事《唐书》上一个字都没有写,然而《南诏德化碑》和《南语》写卷记载了这件事,我就根据《南诏德化碑》中的757年,这么推出来的。所以南语里面有很多的材料,汉字都没有记到,不但涉及语言学的材料,还有我研究的历史材料,有很多篇,深的很。

当时我还没有翻译完,很按捺不住,马上写了论文。这个题目叫:《隋唐婢药(附国)历史研究——兼论该国为〈格萨尔王传〉重要史料来源之一》。因为它又涉及到《格萨尔王传》第一卷的问题,说我们藏王如何如何勇敢,打下天下,建立岭国。反正只要有发生过的历史事件,老百姓必然要记到,必然要传出,口耳相传下来,《格萨尔王传》的确有根据的。但是,难免不会张冠李戴,它把藏王戴到松赞干布的脑袋上,当然不对。而且岭国比吐蕃松赞干布的时代早,松赞干布是唐代的,但岭国大致是581年到618年的隋代,涉及到很大的国家。它是以邓柯为中心,直到道孚的北边,恰好《南语》卷子写到。任乃强老师也写了,他根据李鉴明说的:去道孚的北边,青海的腹部安多,这个地方都是附国传记载的。这个《南语》卷子里面附国叫 hbe hbah,附国的附字,不读 fu,我们汉语声韵学,读为 biu,当时它不能读 fu, fu 是后来变的。原来用这个“附”音读为 biu。跟藏语的“附”完全一样。这样历史可以推倒重写。我这篇文章就写到《西藏通史》里,北京藏学研究中心把它发表了。

因此,南语涉及到《格萨尔王传》,比如,《格萨尔王传》萨当-姜这个国家。姜岭大战,姜国跟岭国大战,南语书里谈的完全是姜,姜

是藏语。“姜”,藏语里念 hldyang, 这个字整个拼起来,叫楼头,烧当即读萨当,指康定南边的沙德区。康定的南边一直通到木里,通到云南的宁蒗县。宁蒗有个永宁区,永宁区叫作楼头嘛、萨当。楼头国在藏语里变成姜国了。我也写了文章,还没发。

古蜀国历史研究很重要,也很难。我不过是增加民族学的乌牛白羊两系,当年冯汉骥老师嘱咐的,我在搞这个。黑和白寄托在蜀国国王的身上,这个思路不错。但是具体是哪一个,说不清楚,有困难。我正在搞鱼凫王,她来自何处,怎么到的三星堆,但问题是中间有个大窟窿,没材料,这个要命。其实青铜器材料多的很,三千多年、四千多年,殷商的青铜器上有铭文资料,必须有专家帮忙。假如我学一学甲骨学、青铜文字多好,就不被卡住了。

陕北渭水河是一个古老的地方,传说姜太公在那里钓鱼。那里有两个系统互相婚姻,之后,其中一个就走入民族走廊。我国华西民族走廊是研究我国人类学、民族学很重要的地区,北起陕西、甘肃省分界地区,通向甘南,直达四川南坪,又通过松潘县,南下茂县、汶川,再行南下至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,抵达康定。以上一段路程,考古学家称之为马家窑文化,下分三种类型。即半山类型、马厂类型和马家窑类型。但是夏鼐先生则略有更动,夏先生认为半山、马厂类型接近,他把这两种类型文物归为一类,即马家窑类型、半山-马厂类型。据陕西文物研究所石兴邦主任认为,马家窑类型的文物不是出于墓葬,而是出自家庭废墟。彝族自古施行火葬,我猜测马家窑类型与彝族有关,是黑的,半山-马厂类型是白的。

民族走廊一直通向缅甸。伊诺瓦底江的江口仰光的旁边,有个城叫普米城。普米就是这个普米,迁移到那里。关于民族走廊一直到缅甸这个问题,我们写了文章,发表在《白狼歌》附录上。^⑥有人说白狼语在缅甸,本来我也不清楚,读英国人哈威写的《缅甸史》,我有些莫名其妙,他也没弄清楚。我研究发现,事出有因,白狼部落的确迁徙到了缅甸,没有瞎说。现在的缅甸语字典里,包括普米语。南诏把缅甸的三千个统治者抓到昆明,之后,配隶插队,这儿插一个那儿插一

个,完全把亲权割裂开,没有父母子女,完全破坏血缘关系。于是,这三千人很快被改造。南诏这个方法太厉害了。普米人都经过南诏的统治,多年之后,很多普米语就融进去缅甸语中。缅甸字典也就包括大量的普米语,所以他们根据这个字典,把白狼语查出来。还有什么话好说呢,的确这是缅甸语,但事实上是融合了。南诏把这黑的三千统治者压迫之后,加以融合改造,改变成为缅甸人。所以缅甸历史也就清楚了。

我在研究鱼凫王。西北有个地方有两个部落,一个叫鱼,一个叫水鸟。水鸟他们叫凫鸟,鱼凫的鱼跟凫,它们是两个部落,后来凑成了一个部落。鱼凫部落中有人当王了,蜀王中一个很重要的王。比如说这个“鱼凫”,林向教授和高大伦院长(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)他们在这次(2010年11月13日在成都市温江区举行的“鱼凫文化高端论坛”)会上,轰了一炮,说这个鱼凫就是第一个蜀王,这夸大了。但是他这样夸大很有影响,因为鱼凫很重要。我就在搞鱼凫,鱼凫的困难在于它有个空白,一个大洞,不知道怎么填充。鱼凫是在渭水河北部的,根据水鸟,根据鱼,这个线索找到了。除了金沙和三星堆之外,已经发现有鱼凫王城址在温江,所以他们认为温江大有希望,就大量的发掘。我们四川的金沙、三星堆以及温江,都有可能再出现鱼凫王大量的痕迹。一个在陕西西北五千年,一个就在四川,相差大概一千多年、两千年。鱼凫王一个人要占两千年,这个就有原因。它不可能是一世,可能是多世,所以每一个王,后头都带着小尾巴。蚕丛王大概是三四百年,柏灌王大概也是两三百年的。我的看法是她们还处于母系社会,那个时候还没有转入父系。母系社会不是父子连名,主要是父系社会用父子连名,母系社会没有转世,大体一算,沿袭部落名就了事,所以就有一人要占两千年的鱼凫王。父系则有年代,羌人转入父系的第一世叫南喀,第二代叫巴拉。巴拉,白狼。白狼又拼读为藏文 Pram,音读顎化以后,又可以读 dzang,札。第三世,多,就是“好又多”这个多。成都这个地方也叫多。“多”这个地方产生了三个地区,一个在青海

的腹部叫安多。另一个就是四川的平武,他们的白马藏民自称为多。第三个就是西昌的冕宁,就是多区,这个我们搞了。平武是介绍一个川大的德国留学生去的,^[9]他研究金面具、跳舞。他在教书,是讲师,大概在教考古学,教中国的玩意儿,很吃香。

鱼凫在三星堆、金沙遗址,可能在温江还会发现,清华大学的李学勤老师、西北大学的张懋镕教授和我是坚持到底的几个人。张教授可能60岁不到,精力充沛,材料在他身上。他在《考古学报》登出来的这篇文章(《西周青铜器断代两系说刍议》,2005年第1期)中,列了一个青铜器表,而且标明某一种青铜器属于黑的,属于牛首,牛首器大概有三十多件。张教授说西周的青铜器太粗糙了,比不上殷商的青铜器,可能有两个系统的不同。他说对了。他用民族学的二系,加上青铜器的研究,就有两个系统了。我们交了朋友,他要我的东西,我就全部交给他一套。

我现在还在写一本《牛首与羊首—古蜀史初探》的书。这本书是1944年动手的,随时调查随时就写。严格说有二十多篇属于黑白两系,我预备再写二十篇,就交卷。四十多篇这么厚,但是起码要两年时间。材料都是现成的,但是精力没有了。这些材料里面有我的那个系谱,就是汉藏语系民族与牛羊二系的对照表。^[10]我梳理的这个乌牛白羊双系,它对我研究四川古蜀史,帮助很大。我搞广东沿海的苗瑶族系,是受好朋友建筑工程师江道元的邀请弄的,结论是苗瑶属于彝,他们是牛首,牛脑壳。牛脑壳就是黑牦牛,它是图腾。黑牛,彝族叫牦牛,纳西族叫牦牛,苗族叫水牛。白山羊,必须是山羊。侗族还有一个叫岗(音),有个图章印出来叫甘,甘肃的甘,叫丹族。这个丹族,我想可能是羊。因为白海螺叫 dung-dkar,这边山羊叫白的叫东噶尔(音),读音相同。还有壮族,这边叫宗喀,他那边也叫宗喀。所以我想这两个族是羊。苗瑶崇奉伏羲、女娲这两人,伏羲、女娲是牛脑壳,伏羲的一个图样,上边一个牛首,底下一个穿袍子的男生,他也是牛。

五、您翻译了很多国外学者的著作,除彝学、藏学外,可以谈谈您对国外民族学术的看法吗?对于学术传承,您对后来人有什么期望?

我主要关心两大工程。一个工程就是，有个叫莱维-斯特劳（Lévi-Strauss，列维·斯特劳）的法国人，他是结构人类学派很出名的人物，三年前一百岁死的。他的东西很丰富，而且写得非常好。但是他关键的问题，就是否认两系的说法，他利用天主教神父的材料，写了一本书，强调说没有。因为民族学有人认为是这个黑白两系（乌牛白羊）的说法。没有就说没有嘛，他还荒唐的很，说天文学出了伽利略，民族学、人类学也出了“伽利略”。他说，现在欧洲有一个人叫里弗斯（Rivers），里弗斯是“伽利略”，他就坚决不承认有两系。斯特劳还说莫斯（Mauss）是牛顿大师。“伽利略”的问题真是荒唐，学术界不应该有这种味，不应该沉默。我预备写文章，书查到，已经找出材料。^⑩我搞的恰好是有两系的，正在写作中。这是一个问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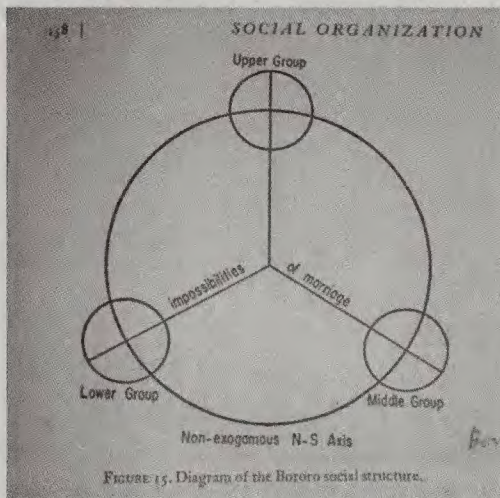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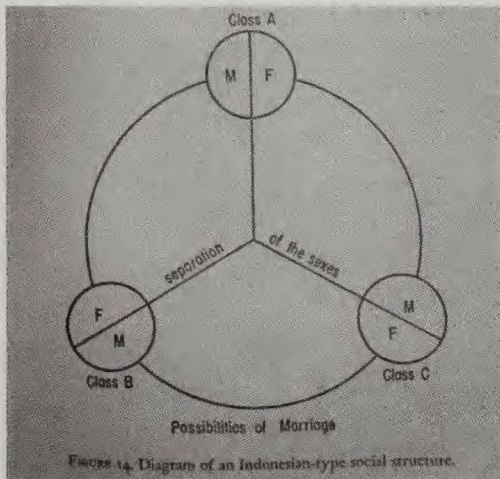


图6-图7 三系部落婚姻关系图表

图6婚姻的可能性（以印尼部落类型的社会结构为例，表明三个部落两性男女之间的婚姻方式）图7不通婚的北-南轴（以Bororo部落的社会结构为例，表明三个部落中，第三个部落（Lower Group）不可能与第一个部落（Upper Group）通婚）

（引自 Claude Lévi-Strauss, *Structural anthropology*, New York: Basic Books, 1963, pp. 156, 158.）

这个材料是天主教的两个神父做的，Bororo是南美的一个小部落，书上有介绍。斯特劳利用神父的资料搞的这个东西，产生三个部落，第三个部落跟第一个部落不通婚，不通婚就等于没有二种族制，没有两个婚姻团体。他否定了二种族制。这是第一。但是，如果一个部落分化成两个部分，不通婚，男女怎么办；不能通婚，但等一下，它会变化的，可能会通婚的。这么简单的道理，这说明他的幼稚。但是斯特劳不管，他就下结论：不通婚就等于没有二种族制。第二，他紧接着把里弗斯和莫斯提升。但他也没说原因，没说结构学派，只说，我们这个民族学应该有“伽利略”，里弗斯可以做伽利略，莫斯可以做牛顿。

他跟恩格斯的观点完全不同。恩格斯认为，由北美加拿大到北美，到中美，一直到南美火地岛的印第安民族，同一个民族，他们彼此语言听不懂，风俗习惯本来有一定的特点，现在看不出来。民族学就不能用了。我同意恩格斯的观点。如果要查历史，斯特劳说只能查到一点。就是从加拿大起，有个熊部落。^⑪我们中国的是白山羊和黑牦牛部落，一直通到伊诺瓦底江的江口，快下海了。他说没有历史可查。就是这么一个理由，多了一个部落出来，这个部落跟其他部落不结婚，他就说没有二种族制。

另外一个问题，我的最后一个工程—第二本书（《牛首与羊首—古蜀史初探》）出了，就算结束，封笔了。目前成都考古文物研究所在发掘温江，每年这么厚一本发掘报告。现在把精力都摆到温江，用锄头挖蜀国。我认为希望很大，他们走对了。所以我也在准备完成这本书。那么我就留一句后话，我把上面这两个问题提出来，作为对青年的盼望。

钱学森老师提出问题，为什么大学培养不

出来全优秀的人才？就是学科分科太多，一来就给你弄到框框里去了。我不同，我在辅仁大学，就只念14个升级的学分，其他就念历史系中西交通史，社会学系人类学、民族学，就都搞这些去了，结果你看，我一出大学就留在社会系。这个兴趣就要多，我的兴趣是广泛的。

我对于国外研究我国的藏族、云南的独龙族、傈僳族颇感兴趣。那就是说首先对《皇家亚洲学会杂志》JRAS，继而对孟加拉分会 Bangala Branch，中国上海亚洲分会等分会均分会杂志；此后，对德国天主教主办的《人类学》Anthropos，《华裔学志》Monumenta，意大利科学院办的《东与西》East and West 等杂志，都喜欢。通过对世界民族学史的学习，才知道天主教教规规定，传教的神父都有责任弄清当地民族的风俗和语言，并为罗马教皇博物馆搜集文物。因此，他们民族学的资料很丰富。天主教原人类学观点是泛埃及主义，认为一切文化起源埃及，再由埃及传播于全世界。我在辅仁大学期间，领导根本回避此一观点。我根本没有听说。不过，我比较喜欢的是匈牙利学者们，由于他们与古代匈奴有密切关系，他们熟练地掌握蒙藏文，然后对蒙藏史进行研究，比较确切、成功。其著名人物有李格蒂 (Lee Getty)、乌瑞 (Wu Rui)、卡内 (Card) 等。

另外就是，多学一点东西。比如说我去搞藏文翻译去了，藏文翻译是七千件，连普米的是八千五百件。我翻了四万件，三十三年，把腿的肉都翻没有了。所以不容易，必须学点藏史，学点羌史。这是一方面。另外一方面，考古方面的，也可以学点，这三个是不可分的。何必不多学一点呢。就说：你学了考古，你必须学历史，必须学语言；你学了语言你必须学考古，学历史；学了历史，你考古语言都要搞。就是这么个意见，多学点。

一方面还要坚持，不能动摇。你搞了你动摇，想做买卖发财，那不行，对你不利。就这么几个观点，三个观点。

我这个东西绝不了。不光我在搞，还有权威，羌语的权威中央民族大学的黄布凡教授，也在搞。我在考虑这个差百分之五的工

作，就是在这儿摆到的，最大的敦煌1号南语写卷。1号南语写卷是一个很要害的问题，我必须完成，我再病了也要把它完成。我是学民族学的，半路出家，但是逼到那个语言学去了，我才去搞语言学，现在整个陷入语言学里边。《敦煌古藏文拼写的〈南语写卷〉释义的问题》这篇文章名字改成“研究”了。敦煌藏文，本来是藏文，但是它是南语写卷，那么干脆写“研究”算了。《南语写卷》这本书，加上大量的注释，我估计有一百多万字。只差百分之五了，我就害病，摔跤了，摔跤。我全力研究南语去了，没注意我的身体，所以这样糟了。摔在这儿（腰椎处），又是三个月了。

所以你们运气也好，碰到我还没死。我当然要充分的告诉你们，这里边的内容怎么走，得慢慢地谈。这个老师是重要的，我跟你说，我都是老师热心指拨成功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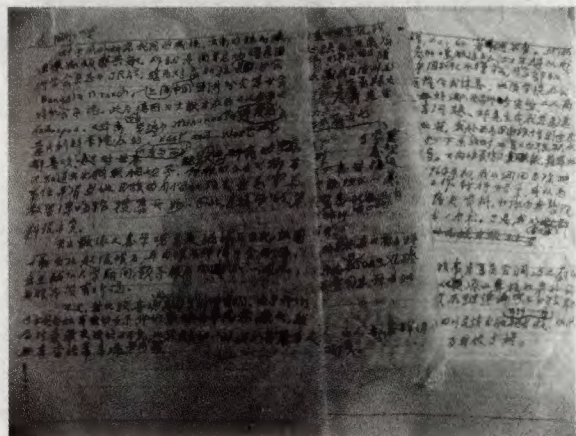


图8 陈宗祥先生对本次访谈提问的部分手写补充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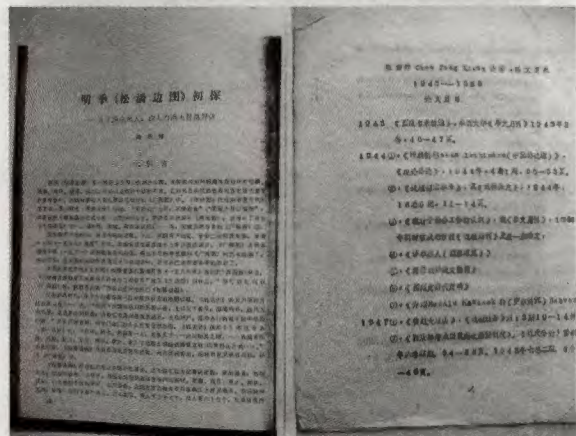


图9 陈宗祥先生提供的《明季〈松潘边图〉初探》的论文复印件及他的论著、译文目录油印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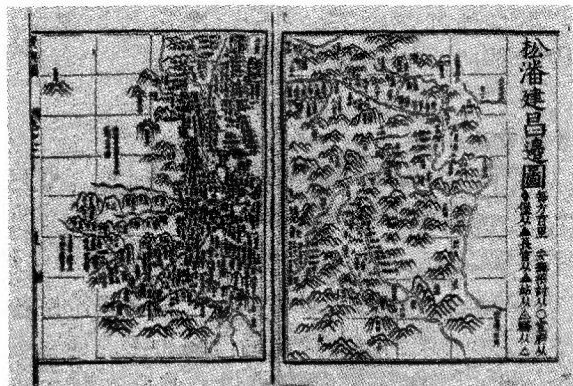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0 陈宗祥先生提供的(明)《广舆图》之“松潘边图”(清嘉庆四年(1799)章学谦万历刻本)

说明:章影、张强访谈,张强录入,章影校订、整理,经陈先生及家人审校,授权公开发表。

注释:

①[奥]海门道夫 C. Von Furer-Haimendor:《苏班什里河的阿帕达尼族》,1953年,是一篇中印边界东段的调查报告。附有地图一张,四十八张像片。当年即送交中央民族学院费孝通副院长处。以后海门道夫出一专书,由吴泽霖先生译出。据胡文明撰《伏枥的老骥——记民族学家陈宗祥先生》,及所附:《陈宗祥的主要著译》(该文附于陈宗祥著《岭国社会组织初探》,土登尼玛、周锡银主编《格萨尔研究丛书》,四川省《格萨尔》工作领导小组编印,1994年)。

②见下文,陈先生的相关资料,文革抄家时被毁。

③陈老手写补充:人口(包括男女黑主、男女曲伙、女锅庄、男女安家)、婚姻、锅庄、安家、曲伙、田地、房屋、牲口(包括猪、小猪、母猪、马、羊、牛、母牛)、冤家。

④参见[法]A.大卫·尼尔著,陈宗祥译:《岭超人格萨尔王传》,陈先生在“译后记”中提到何剑勋教授提供给青海省文联出版该书译稿一事。

⑤老宁波以此比喻当学徒时被辞退的人。如果在学徒期间被辞退,这个人以后在社会上就抬不起头来。如果再去当学徒,就像“吃回汤豆腐干”一样没有味道了。

⑥据陈老介绍,当时小学学制为六年,

“戴帽子”小学指的是小学设有初一年级的班。汇文小学与汇文中学都是教会办的学校。

⑦1941年6月顾颉刚受朱家骅之邀从成都到重庆主编《文史杂志》。

⑧[法]A.大卫·尼尔著,陈宗祥译:《岭超人格萨尔王传》,《康导月刊》1948年9、10期合刊载其序幕一、二;1960年青海省文联出版全书译文;1985年由杨元芳校订,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印。学界认为,任乃强为该书所作序言和《〈藏三国〉的初步研究》,以及这部译稿,是研究格萨尔王最早的参考资料。

⑨据陈老女儿介绍,还有曾受惠于此的人来看望过陈老,他们感谢陈老,说正是因为陈老当年的帮助,才使得他们走出大山,改变了一生的命运。

⑩据陈波著《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·李安宅小传》,李安宅1941-1947年担任华西协成大学社会学系主任,1947-1949年赴美英教书和访问。20世纪50年代初,从军入藏。1956年至西南民族学院工作。1962年调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。成都:巴蜀书社,2010年。

⑪据李安宅先生的说法,“因为助学金数额小,在美生活不足,未能如愿。”参见李安宅著,陈波整理:《回忆海外访学》一文,《中国人类学评论》第16辑,世界图书出版社,2010年。<http://www.cranth.cn/1012/00007.html>

⑫据陈宗祥、邓文峰著:《〈白狼歌〉研究》(一)增订版序言,陈先生迟至1977年才在北京再次看到《南语》一书,他复印了王尧转借傅懋绩自英伦带回的《南语》。成都:四川人民出版社,2010年,第14页。另,据陈先生介绍,《〈白狼歌〉研究》增订版在1991年第一版的基础上,主要附录了《“於弥”为噶末部落试证》、《试论缅甸的黑人白人部落群体》两篇重要的文章,这是他近年来研究《白狼歌》的新成果。陈先生在访谈中,还多次提及他尚有5%就快完成的《南语写卷》研究一书,可推知这些《南语》研究取得的成绩,都得益于当年所看到的李安宅先生买回的《南语》,并由此引发的好奇心和兴趣。

⑬请参阅陈宗祥、邓文峰著:《〈白狼歌

>研究》(一) 导言·增订版, 包括歌辞校勘、地望的探讨和本语研究述评三部分, 对白狼语调查一事有涉及, 可与陈先生的口述相互补充。

⑭陈宗祥、邓文峰著:《〈白狼歌〉研究》(一) 增订版序言, 据木里政协普米族老人杨德福巴宗介绍, 普米呷巴(姑复部落)的桃巴方言已变成了普米族的普通话, 根本与《白狼歌》对不上。第7-8页。

⑮《白狼歌》研究(一)·导言, 增订版, 指出普米族的於弥语仅在木里县第二区原大坝乡(今改牦牛坪乡)波波、叶叶、泥珠等村落流行。第19页。

⑯陈宗祥:《试论缅甸的黑人白人部落群体》附录于《白狼歌》研究, 第260-287页。

⑰陈先生的二女儿陈小珍老师遵父命, 提供了她摘抄的法国三位结构主义人类学派学者, 即 Lévi-Strauss, Claude 莱维-斯特劳斯·克劳德(1908-2008)、Rivers, William Halse 里弗斯·威廉·哈尔斯(1864-1922)、Mauss, Marcel 莫斯·马塞尔(1872-1950)的生平简介, 便于访谈者了解这一学派的观点。陈先生认为, 莱维-斯特劳斯指认的民族学上的“伽利略”即里弗斯·威廉·哈尔斯, “牛顿”即莫斯, 其实都是结构人类学派的重要人物。结构派就是一个静止派, 它不讲发展和事物的来龙去脉, 切出一个断面, 就下结论。摩尔根的进化论是由蒙昧到野蛮, 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观, 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两百年了, 但是《参考消息》大多数评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到今天还是站的住脚。

⑱关于熊部落等三个部落的表述, [法]克洛德·莱维-施特劳斯著, 俞宣孟等译《结构人类学》(第二卷)(译著所据为1996年英文版, 无此二图表)第二部分《社会组织》中提到:“在温内巴戈的例子中, 雷丁说(1923, 第241页), ‘一个报告员……说……氏族是编为三个集团的, 一个由雷乌氏族统治, 另一个由水仙统治, 第三个由熊氏族统治。’这足以证明, 一个三元的系统是存在的, 至少是以潜在的状态存在着。这真是大大超过了我们的期望, 尤其是, 这来自世界上一个还没有对实行

三元系统怀疑的地方”。上海译文出版社, 1999年, 第85-86页。

参考文献:

[1] 陈宗祥. 岭国社会组织初探 [M]. 尼玛、周锡银主编《格萨尔研究丛书》, 四川省《格萨尔》工作领导小组编印, 1994.

[2] [英] 海门道夫著, 吴泽霖译. 阿帕塔尼人和他们的邻族-喜马拉雅山东部的一个原始社会 [M].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油印本, 1980.

[3] 戴庆厦, 黄布凡, 等.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 [M]. 北京: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, 1992.

[4] 代刚. 康定木雅部落源流试探 [Z]. 载格勒主编. 横断山民族文化走廊-康巴文化名人论坛文集. 北京: 中国藏学出版社, 2004.

[5] 陈宗祥. 横越大凉山 [J]. 边疆服务 1947 (15).

[6] 陈波. 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·李安宅小传 [M]. 成都: 巴蜀书社, 2010.

[7] 李安宅著, 陈波整理: 回忆海外访学 [Z]. 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6辑. 世界图书出版社. 2010.

[8] 邓文峰, 陈宗祥. 《白狼歌》研究 [M]. 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, 1991.

[9] Chen Zongxiang. A Discussion on the Meaning of the Patterns on the Jade Zhang from Sanxingdui [J].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. 2005 (6) p. 156

陈宗祥. 试论三星堆玉璋图案的意义 [J].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, 2005 (6): 156.

[10] 陈宗祥. 汉藏语系民族与牛羊二系对照表 [J]. 凉山民族研究, 2003: 335-368.

[11] [法] 克洛德·列维-施特劳斯著, 俞宣孟等译《结构人类学》(第二卷) [M]. 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1999: 85-86.

收稿日期: 2012-04-10 责任编辑: 王珏